

经济学家之经济学家

与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候选者的对话

INSIDE THE ECONOMIST'S MIND
Conversations with Eminent Economists

〔美〕 保罗·萨缪尔森 (Paul A. Samuelson) 编
威廉姆·巴耐特 (William A. Barnett)

曹和平 雷震 叶静怡 等译

曹和平 审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经济学家之经济学家

与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候选者的对话

INSIDE THE ECONOMIST'S MIND
Conversations with Eminent Economists

(美) 保罗·萨缪尔森 (Paul A. Samuelson) 编
威廉姆·巴耐特 (William A. Barnett)

曹和平 雷震 叶静怡 等译
曹和平 审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7-160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学家之经济学家/(美)萨缪尔森,(美)巴耐特编;曹和平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10

ISBN 978-7-301-14225-7

I. 经… II. ①萨…②巴…③曹… III. 经济学家-生平事迹-世界
IV. K81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8367 号

译自 Inside the economist's mind: conversations with eminent economists / edited by Paul A. Samuelson and William A. Barnett.—1st ed. Copyright © 2007 by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except as permitted by the U. K.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Oxford.

Translated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from the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version.

Responsibility of the accuracy of the translation rests solely with the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not the responsibility of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书 名: 经济学家之经济学家:与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候选者的对话

著作责任者:[美]保罗·萨缪尔森 威廉姆·巴耐特 编

曹和平 雷 震 叶静怡 等译 曹和平 审校

责任编辑:王花蕾 张慧卉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4225-7/F·2024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926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em@pup.pku.edu.cn

印 刷 者: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87mm×1092mm 16 开本 29 印张 473 千字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4000 册

定 价:4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译 者

序 言 一 曹和平(北京大学) 顾秀林(云南财经大学)

序 言 二 顾秀林(云南财经大学)

序 言 三 雷 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第 一 章 雷 震

第 二 章 雷 震

第 三 章 雷 震

第 四 章 雷 震

第 五 章 雷 震

第 六 章 顾 婧(云南大学) 曹和平

第 七 章 曹和平 顾 婧

第 八 章 曹和平 顾 婧

第 九 章 曹和平 顾 婧

第 十 章 顾秀林 陈 刚(云南财经大学)

第十一章 顾秀林

第十二章 曹和平

第十三章 叶静怡(北京大学) 韩吉平(北京大学)

第十四章 韩吉平 叶静怡

第十五章 叶静怡 韩吉平

第十六章 曹和平 顾 婧

审 校

全书审校 曹和平

序

经济学家人数是比较多的,但在经济学史书籍中能占有一席之地的,却寥寥无几。比如说,整个 19 世纪,出了那么多位经济学家,但被写进 19 世纪经济学史的,有几人?再如,20 世纪前半期,又出了那么多位经济学家,但今后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史中占有位置的,又能有几人?按照这样的筛选,将来能在 20 世纪后半期的经济学史列名的经济学家会有多少,又有谁能说得清楚呢?谁又能准确地预料到呢?

也许有人会说,经济学史书籍是由这一领域的专家撰写的或主编的,各人有各人的评价标准,各人有各人的选择原则,说得更具体些,各人有各人的倾向性或偏好。因此,很难以此作为定论。不仅经济学史如此,文学史、哲学史、政治学史不都这样吗?还有人说,自然科学史可能争论会少一些,比如说,如果撰写一部近二三百年的物理学史、化学史或数学史,就不会像经济学史有这么大的争议。当然,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不同,所以差别肯定是存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然科学史书籍的作者或编者不会有自己的评价标准、选择原则、倾向性或偏好,只是不像人文社会科学这么突出而已。

于是就涉及在经济学方面对经济学家贡献的评价问题。任何一位经济学家要想在经济学研究中作出贡献并得到同行的承认,必须符合一个基本条件,这就是:相比前人,他为经济学这门学科多提供了什么,无论是在规范经济学领域还是在实证经济学领域,也无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在方法方面。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大师们,都是在经济理论或经济学方法上作出了新贡献的。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如果能在经济学史上留下名字,也都是凭依他们在经济

学理论或方法上的超越前人的成就。经济学的生命在于创新,经济学正是靠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不懈地努力、不断地突破、不断地创新,而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从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发展历程,不正是这样吗?

这又涉及另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一位经济学家在哪方面超越了前人、作出了贡献,究竟该由谁来评判?谁是权威的鉴定者?难道仅仅是同时代的专家、同行?难道这些专家、同行就不带有倾向性或偏见?进一步说,假定有好几位经济学家被认为超越了前人,但却是分别在经济学的不同领域内作出了贡献,而只能从中选出一人,或至多二三人,那么如何衡量他们贡献的大小?谁又是有资格的裁判人?像这样的问题都是不容易弄清楚的。那就只好笼统一些、含糊一些,但一笼统、一含糊,岂不有失于公平和公正?于是我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我曾参加过的国内某些评奖活动。评奖中的一种是,一遇到名次排列常常运用“平衡术”,把不同候选人的所在地区、任职单位、经历或知名度等考虑在内,以求得“平衡”。如果为了做得更细致些,不妨再把以前若干次获奖名单拿来对照一下,照顾到大学科下面的各个分支学科,使“平衡”工作更加有效、更加稳妥。但愿这种“平衡术”只是个别现象而并非生活中的“潜规则”。

经济学家所作贡献的评价问题确实是存在的。怎样解决呢?我想,用经济学“验证的滞后性”来检验可能是解决经济学家所作贡献评价问题的途径之一。经济学理论的一种新观点或新提法,当它刚出现时无非是一种假设,它必须经受实际的检验,而且应是多次检验,才能被认为是正确的,才能称得上是理论或方法上的创新。同时还应当认识到经济学验证是滞后的,滞后的时间不会很短,有些甚至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就是说,这一代经济学家所提出的某种假设,也许要由下一代经济学同行们根据验证的结果才能作出恰当的评价,至少这一代经济学家年轻或中年时所作出的贡献,要等到晚年时才能被同行们所确认。离开了实际的验证,就谈不上是真正的理论创新或方法创新。当对所有的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都采用“滞后的验证”时,评价就会公平、公正。

在谈到经济学的创新时还应当注意到其另外两个特点,一是“出现的连续性”,二是“成员的团队性”。它们同前面所说的“验证的滞后性”并列。

经济学创新“出现的连续性”是指:在一项创新出现之后,不管它是不是经历了“滞后的验证”,只要被经济学家同行认为是一项新的研究成果,就会引起同行们的注意。有人对该项研究进行追踪研究,有人在该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作进一步的探讨,有人扩展了该项研究的范围,有人发现了该项研究的缺陷和不足并作了修正,更有人从不同的角度对该课题进行探讨并提出了新的见解。应当说,正是该项研究成果引领了一系列衍生的、新的研究成果,所以经济学创新必然具有连续性。经过若干年后,当最初的那项研究成果得到“滞后的验证”而被确认后,一系列衍生的成果也就被肯定下来了。当初,不正是先有了瓦尔拉斯均衡理论,才会有一系列有关均衡理论的新发展,以及非均衡理论的提出和系统化吗?不正是有了凯恩斯的《通论》,才会出现一代又一代的追随者及其对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和投资函数理论的扩展吗?这就充分说明了经济学创新“出现的连续性”。

关于经济学创新“成员的团队性”,曹和平教授已经在《经济学家之经济学家》的译后感言中作了论述。简要地说,经济学创新实际上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集体智慧总需要有一个核心,无论它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一个杰出的学科带头人,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助手、学生或追随者,他们可能是同一学科的,也可能是跨学科的、交叉学科的。他们循着同一个方向钻研,也可能扩展各自的研究范围进行横向的研讨。他们相互讨论,甚至争论不休,但这无碍于学术团队的形成和成长。这样,经济学研究中就可能有突破,有创新。而且,这样的学术团体绝不是封闭的,封闭的学术团队出不了大的成果,并且研究中有了差错也不易被及早发现和纠正。经济学创新中“成员的团队性”和“出现的连续性”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但又不是一回事,因为后续的经济学的创新既可能连续出现在同一个学术团队中,也可能出现在其他学术团队,甚至可能出现在彼此观点针锋相对的学术团队间。

显而易见,在“验证的滞后性”、“出现的连续性”和“成员的团队性”三者之中,“验证的滞后性”对经济学的创新是最重要的,从而也是最值得关注的。

我为之写中译本序言的这本《经济学家之经济学家》收集了里昂惕夫、卢卡斯、莫迪利安尼、索洛、弗里德曼、萨缪尔森、奥曼、托宾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和其他几位著名经济学家的访谈录,他们无疑是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从已经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来看,他们经受了经济学“验证的滞后性”这一原则的检验,因为他们获奖的凭依都是以若干年前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经过了多年的实际检验而得到同时代或稍晚时代的经济学同行的确认。他们无愧于“经济学创新者”的称谓。同时,在他们当年所提出的某个新观点或新假设的

启发下,一系列衍生的研究成果相继产生了,有些成果还有很大的创新性,所以经济学创新“出现的连续性”也得到证实。加之,在这些经济学大师的周围,陆续聚集了一批有志于从事研究工作的助手、学生和追随者,这又证实了经济学创新中“成员的团队性”。当我们说某些经济学家的学说或观点经过滞后的验证而被确认为经济学创新时,并不意味着它们会一直正确。道理是很清楚的,客观环境在变化,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在变化,一国的国情在变化,所以几十年前被验证为符合实际的学说或观点,环境和形势变化了的新情况下重新验证(这同样属于“滞后的验证”)时,可能就不会得到几十年前那样的结论了。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一部经济学史,从某个角度来看,也许就是理论和方法不断创新的历史。这种情况有些类似于技术创新的历史。工业革命以来,世界上哪有百年不变的技术创新?甚至二三十年不变的也不会有。但有了后来的创新,难道就可以否定以前的创新?就可以把以前的创新说得一文不值?尊重历史的人是不会这样简单地看待创新的。

经济学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经济学一代一代向前发展。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就是尊重历史。后来居上固然是一个规律,代表一种趋势,但后人总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谨以这样几句话,作为中译本序言的结尾。

所以,序

2008年10月9日

本书是清华大学出版社“清华学术”系列中的一本，旨在探讨个体学者的传记与学科传记关系的反思。

本书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旨在探讨个体学者的传记与学科传记关系的反思。

序言一 个体学者的传记与学科传记关系的反思

本书旨在探讨个体学者的传记与学科传记关系的反思。

保罗·萨缪尔森 (Paul Samuelson)

麻省理工学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本书旨在探讨个体学者的传记与学科传记关系的反思。

这本书的整体大于它的各个部分相加之和。当萨默塞特·毛姆 (W. Somerset Maugham) 说“要深知一个国家你必须了解两个国家”时，他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明“1 + 1 大于 2”的道理。运用亚当·斯密 (Adam Smith) 和艾琳·杨 (Allyn Young) 的理论，这就是“规模收益递增”。

当一个学科处于快速发展的动态阶段时，不论是经济学、化学，还是针灸，其领骑者对于是牛顿 (Newton) 还是莱布尼茨 (Leibniz) “发明”微积分这类事很少关注。经济学科正处在这样快速发展的动态阶段，这本书收录的访谈鲜明地见证了这一点。本书让我们能够静下心来，透过现象看本质，更清晰地回望整个学科领域，否则单看个别专家分门别类的研究，我们会很容易忽略全景。21 世纪经济学领域的淘金者 (go-getters in economics) 竭精殚虑，辛勤劳作，却并不知道约翰·贝茨·克拉克 (John Bates Clark)^① 在使边际生产率理论化方面的贡献，要

① 克拉克 (1847—1938)，美国经济学家和边际革命的先行者，边际生产率概念的创始人。——译者注

多于屠能^①洞察边际概念后浅尝辄止而留下的待完成的工作。

这有助于说明一个历史性的事实：过去“经济思想史”课程在研究生教学中所担当的角色，在今天已经蜕变为训练有素专家的几个干巴巴的教条。一个尚未言明的功名心态促成了这样一种现状，用萧伯纳（Bernard Shaw）的话说是“那些能干的，干活；不能干的，教书”。好的科学史应该在大学课程中占有一席之地。单个研究方向在动态发展的过程中，需要从鸟瞰整个学科的视角加以补充，而不是仅仅把分散的部分加总。本书正是提供了这样的现代经济学领域的整体视角，还找到了这个学科整体与那些贡献卓著的著名经济学家的生活经历之间的关联。

回到如何从大量案例中得出结论这个主题上来，让我们检验一下传说中苏格拉底（Socrate）的格言：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去生活。我读过一本很好的介绍哲学大家的书，里面包括了所有常见的猜想，这些大家有：斯宾诺莎（Spinoza）、康德（Kant）、黑格尔（Hegel）、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卢梭（Russell）等。该书的结论是，苏格拉底彻底错了。很难想象还有比这一帮更加令人不快的怪人了——自杀倾向充斥、忧郁症挥之不去、独身主义和离婚层出不穷。庸俗的解释是，哲学研究毁灭了生活的乐趣。宽厚一点的说法也许是，因为从小成为孤儿，或者生来就有学习能力上的缺陷，这类人将会选择当哲学家而不是去当快乐的酒吧服务生。在任何一个需要理解力的学科领域中，获得一个目标、得到深刻的全景视角，都是关乎非常的，但是没有掌握酒吧服务生的技巧那么容易和快乐。

我们回到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以及以下的问题：这个学科为什么会这样一路走到本书展示的这个方向上来？有一位保守派经济学大家曾经说，他对政府反感的来源之一，可以追溯到他在美国南方的先辈被强大的北方经济击败的历史。还有一个非常类似的故事：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写到过，她反对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是因为她的“在尼赫鲁时代的印度朋友多于在欧洲大陆的朋友”。这些仅仅是个人好恶影响意识形态，这是老调重弹。不过，我们能否认为自传中的评判最准确地表达了个人观点？我所知道的琼·罗宾逊，非常可能在

① 屠能（Johann Ludvig Von Thünen, 1780—1850），德国经济学家，对经济学贡献颇多。在其第二本论文集（1850）中，他用数学方法准确定义了分配的边际生产率理论的核心思想。依照他的要求，其墓志铭中刻上了他关于边际劳动产品（自然工资）的公式。——译者注

20 世纪 60 年代想过,她和她所属的后费边主义(post-Fabian)^①可能在印度比在欧洲大陆更容易实施和成功。也许她这样想还真是对的。

公开出版的学术研究,由于其学术的性质,是不去识别作者个人动机的。但是,为了理解本书中启迪心智的内容,我们不需要关注一下这些杰出经济学家从事的研究方向与个人动机的关系吗?如果是,那么这种访谈是否是洞察他们动机的最好方式?

最后提一个关于过去和现在经济学研究方向的无关紧要的设想。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说,“找找那个女人”(Cherchez la femme)。^② 维立·萨顿(Willie Sutton)被问及为什么要抢银行时说:“因为那是放钱的地方。”我们经济学家大体上是在为了获得同行的尊敬而工作,我们的自尊中就包含着被同行尊敬的成分。当大萧条后罗斯福新政提供了令人欢欣的就业机会时,首先是青年大学教师群走向“左”倾,资深教授们为了超过同行,随后抢到了年轻人的前头。在后里根时代和后撒切尔时代,选民们转向右倾,都跟着金钱的方向——唯一剩下的方向。可以说,我们吃的都是自己煮的东西。

我们这些经济学家喜欢引用凯恩斯(Keynes)在他 1936 年出版的那本《通论》(*General Theory*)中的最后几句话,因为那些说法太对我们的虚荣自负的胃口了。可是我们必须承认这个真理:狂人当政可以自己滋养出疯狂,用不着已过世的或者前卫的经济学家帮忙。经济学家建构起来的东西,通常是王子和公众已经想要听见的那些。我们不是待在最好的俱乐部里面,卖弄过去学术上的奇思妙想,或者贩卖学者传奇的人。

实在来说,这本书的内容大于它各个部分的加总。通过展示这个学科中某些当代领军人物的个人动机和经历,本书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不常见到的整个经济学科的全景图。

① 费边主义,亦名费边社会主义。19 世纪后期,流行于英国的一种主张采取渐进措施对资本主义实行点滴改良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是英国费边社(Fabian Society)的思想体系和机会主义路线。1884 年,一部分知识分子创立了费边社,该社成员认为社会改革应循序渐进,故以公元前 3 世纪古罗马一位因主张等待时机、避免决战的战略而著名的将军的名字命名,其学说被称为“费边社会主义”(Fabian Socialism),简称“费边主义”(Fabianism)。——译者注

② “找找那个女人”(Cherchez la femme),一句法文,意思是事情不对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到原因是背后有个女人,有点“祸事来自红颜”的意思,这里指人们惯常的思维方式。——译者注

序言二

关于本书的目的与内容

威廉姆·巴耐特^① (William A. Barnett)

堪萨斯大学 (University of Kansas)

本书收录的访谈向我们展示了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们头脑中的独特见解,他们都是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卓有贡献的人物。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访谈材料的来源:首先发表在声望极高的、经同行严格评审并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本人任主编的《宏观经济动态》(*Macroeconomic Dynamics*)上的文章。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通常取决于评审人的裁决,这样就限制了作者只能发表被评审者、期刊的编辑和主编认为可以接受的内容,大众流行杂志上那种随意的、漫无边际的讨论是不被允许的。在这种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才是科学家更看重的,因为只有这种文章才被承认是严格的、科学水平的证明。于是科学家们通过在学术期刊上的对话以赢得同行的尊重。

即使是最著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都不能不受同行评审的约束而在学术期刊上与同行对话,这对外行来说是很怪异的事情。考虑到这一点,笔者在《宏观经

^① 我希望感谢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的比尔·库坡 (Bill Cooper),正是他最早给我本书的策划思想。

济动态》杂志上编排了一个系列采访项目。^① 因为这是由同行严格评审的学术期刊,所以我们从未在同一期上发表过一篇以上的访谈文章。我们同出版者——剑桥大学出版社达成共识:访谈完全是“引用语”,不能被评审者、责任编辑、版面编辑、出版商改动,我也不能改动,这是一个言论和出版自由的问题,“引用语”是不能改动的。

这份期刊从创刊以来,采访者和被采访者都被告知他们可以在采访中任意交谈,尽管访谈发表的刊物是遵守同行评审原则的学术杂志。结果是,一个学科领域的领头人可以公开发表他想要同行们知晓的与专业有关的任何事情,无论是否牵涉私人的、政治的或者宗教的内容。个人攻击、对不公平和偏见的申述、宗教迫害和政治压力,对政治家、行政领导、公共政策的没有修饰过的强烈批评,这些在专业期刊上总是要被删除的内容,在我们的访谈中都被保留。访谈的参与者可以自由地把这些内容变成“白纸黑字”。某些访谈中包含的争论之激烈,在其他经济学刊物上是不会出现的。无论是刊物的编辑还是剑桥大学出版社都不曾删除过访谈中的任何内容,只有一次,出版社把一个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的咒骂改成缩略语:“f——”。

参与这个访谈系列的有:八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瓦西里·里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弗兰克·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罗伯特·奥曼(Robert Aumann)以及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两位中央银行董事,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前联邦储备董事会主席)、斯坦利·费舍尔(Stanly Fischer,以色列银行总监);还有一位(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罗伯特·奥曼在本书编纂过程中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他几位被采访者也在大多数经济学家心目中是将来最可能的获奖者。无论访谈者和被访者名气有多大,如此其实地披露他们的生活和观点,除了本书和原来发表在《宏观经济动态》杂志上的文字外,在别处是找不到的。

^① 对统计学家的访谈可以在《统计科学》(Statistical Science)期刊上看到;对计量经济学家的访谈可以在《计量经济学理论》(Econometric Theory)杂志上看到。但是,那些访谈主要是关于那两份杂志的技术问题,而不是关于经济学说的一般性问题。

以下曾经发表在《宏观经济动态》上的访谈都是同样重要的,我们计划把它们和目前正在整理的几篇重要访谈编辑一起,作为本系列书的第二卷。这两卷书将在内容安排上作到信息量上的平衡,并反映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们的宽广视野。

Allan Meltzer interviewed by Bennett McCallum (*Macroeconomic Dynamics*, vol. 2, no. 2, 1998)

Elhanan Helpman interviewed by Daniel Trefler (*Macroeconomic Dynamics*, vol. 3, no. 4, 1999)

William Brock interviewed by Michael Woodford (*Macroeconomic Dynamics*, vol. 4, no. 1, 2000)

Karl Shell interviewed by Steven Spear and Randall Wright (*Macroeconomic Dynamics*, vol. 5, no. 5, 2001)

Axel Leijonhufvud interviewed by Brian Snowdon (*Macroeconomic Dynamics*, vol. 8, no. 1, 2004)

Anna Schwartz interviewed by Edward Nelson (*Macroeconomic Dynamics*, vol. 8, no. 2, 2004)

Guillermo Calvo interviewed by Enrique Mendoza (*Macroeconomic Dynamics*, vol. 9, no. 1, 2005)

Assar Lindbeck interviewed by Thorvaldur Gylfason (*Macroeconomic Dynamics*, vol. 10, no. 1, 2006)

为了保持专业上的高水准,我们邀请了世界上经济学思想史的领军人物罗伊·温特罗伯(E. Roy Weintraub)撰写了导言,排在本篇编者前言之后。保罗·萨缪尔森——本书的两编者之一,撰写了有巨大思想冲击力的前言,排在本篇之前。^① 为了突出本书各篇访谈丰富多彩的内涵和其中表达出来的深刻见解,

① 在一封信件中保罗·萨缪尔森对我说,我从不不在乎我的文章抨击读者中最有学问的那些人。罗伯特·布朗宁(Robert Browning)说过:“啊,可是一个人的影响力应该超出他的手掌吧,否则天堂又有何用?”正是出于这种想法,保罗·萨缪尔森才这样解释他写的前言:“我特意不引用凯恩斯《通论》结语中那些广为人知的说法。”然而,我还是为那些不曾与萨缪尔森的超乎寻常的博学相遇过的读者着想,引用了萨缪尔森在他的前言中暗示的凯恩斯的那些话(1936, pp. 383—384):“认为自己不被知识分子左右的普通人,常常沦为一些三流经济学家的奴隶。掌权的狂人,将他们自己的意志充满空间,他们的疯狂,正是借用无耻文人几年前的陈词滥调来彰显。我相信,相比于潜移默化思想侵蚀,既得利益的权力被过度夸大。或早或晚,对我们更加危险的是思想而不是既得利益。”

下面分篇摘引了一些文中最有特色的片断。这些引文已经脱离了原来的语境,所以不能代表全文,只不过是与大师长谈中隽言妙语的一斑而已。

本书发表的所有的访谈都是《宏观经济动态》的原文重印,但是有一部分照片被撤掉了。下面就是读者可以在本书中读到的一些引文片断。

1 瓦西里·里昂惕夫 (Wassily Leontief)

——由邓肯·弗利 (Duncan K. Foley) 采访

瓦西里·里昂惕夫出生于苏联,1973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其时为哈佛大学教授,以投入—产出计划工具闻名于经济学界。下面是关于他的生活和学术观点的访谈片断。

马克思不是很好的数学家,他在数学方面总是弄错,他的劳动价值论没有多大意义。

我在1925年离开苏联。当时我惹恼了苏联政府,为了能够工作不得不离开苏联。

理查德·古德温 (Richard Goodwin) 是我的学生……他没能在哈佛拿到终身教职,后来去了英国……我想可能是政治原因,他是左派。

谈到对遥远未来的看法时,里昂惕夫说:

我想收入分配问题会日渐凸显其重要性。正如我刚才说过的,将来劳动力(在经济生活中)不会有如今重要。问题是如何管理这个系统。人们将通过社会保障拿到收入;现在我们已经在通过社会保障获得收入,而且我们试图发明各种理由为人们提供社会保障。我想政府的作用将变得极其重要,那些试图将政府职能最小化的经济学家恐怕对经济体系如何工作只有一个表面的认识。我想即使是现在,废除政府也会导致全面混乱……其后果是可怕的。

《宏观经济动态》发表了对他的访谈一年之后,1999年,瓦西里·里昂惕夫逝世。

2 大卫·卡斯(David Cass)

——由斯蒂文·斯皮尔(Steven E. Spear)和蓝德欧·怀特(Randall Wright)共同采访

大卫·卡斯曾经对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最深刻的见解,包括“太阳黑子均衡”(sunspot equilibria)的发现,这一理论发表在他和卡尔·谢尔(Karl Shell)合作的论文中。卡斯和宇泽弘文(Hirofumi Uzawa)以及卡尔·谢尔对宏观经济学的动态研究产生的影响,具有经济思想史层面上的意义。为了保持知识的深度,这篇访谈坚决地强调经济学中的技术进步。他在卡耐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任教的时候我在那里读研究生,令我失望的是他没有在那里待下去。他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其中的原因将要在本次采访中说明。

卡斯身上还有丰富多彩的一面,那是学术圈中大家都知道的,这在下面的访谈摘引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不得不找一个新院长。当时在卡耐基的教授们都参与了这个过程……我们最终选择了阿尼·韦伯(Arnie Weber)……从卡耐基和我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个灾难……他来后不久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和他进行了一次面谈。他告诉我,我对学院是一个奢侈品,因为我不研究工商,我研究的是理论经济学,这不是商学院能够支持的。而且他用一种极为可憎的方式说这些话,让我极为恼火,所以我说了“操——”的脏话。

诺贝尔桂冠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当时也在卡耐基任教,卡斯是这样评论的:

可能因为卢卡斯是芝加哥学派的传统,他非常关注经验检验(empirical test)——鬼知道它指什么——但说实话,我对经验检验既不关心也没有兴趣。

尽管因卡斯-库普曼模型(Cass-Koopmans),卡斯成为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开拓者,但他却这样说:

我觉得实际经济周期理论问题几乎像一种宗教。

3 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 Jr.)

——由本耐特·迈考卢姆(Bennett MaCallum)采访

罗伯特·卢卡斯 1995 年获诺贝尔奖时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在访谈导言中,他的采访者本耐特·迈考卢姆是这样写的:

至少在宏观和货币经济学领域,卢卡斯是被广泛认同的过去 25—30 年间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

在这篇访谈中,读者将要看到卢卡斯如何在七八岁的时候,由于听了父亲讲述的社会主义国家送奶车的经济学故事,而从此对经济学发生了兴趣。关于后来在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的经历,他自己是这样讲述的:

当我在芝加哥大学学习时,那里的氛围是如此敌视任何形式的计划,以至于我们没有被教导去思考在某种情况下资源应该如何分配、人们应该如何使用他们所知道的信息来形成期望。但是这些总该是一个经济学家首要思考的问题。我父亲认为社会主义有效率地配送牛奶的想法错了,但他在思考牛奶应该如何被配送时却没有错。

在卢卡斯的陈述中,还有这样的文字:

所以我对总均衡理论在宏观经济上的成功感到高兴,但对这些成功所带来的对货币的忽略感到难过。

谈到技术冲击的重要意义时,他这样说:

如果是 20 世纪 30 年代的美国大萧条,或者今天的印尼或者五年前墨西哥的萧条,我认为技术冲击只是故事的很小一部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谈的是战后美国的经济波动……那么技术以及其他实际冲击在其中的分量就大得多。

在回答“价格粘性是否为重要的经济现象”这个问题时,卢卡斯是这样回答的: